武漢大學學報【哲学社会科学版】
WUHAN UNIVERSITY JOURNAL (Philosophy & Social Sciences)
第69卷 第5期 2016年9月
Vol. 69. No. 5 Sept. 2016. 036～046
DOI:10.14086/j.cnki.wujss.2016.05.005

美国民主输出与输入国的政治困境

龚文婧

摘　要：后发国家的民主化转型应放在“第三波”世界民主化浪潮的背景下进行研究。“第三波”世界民主化浪潮的发生受到美国民主输出的重要影响。在美国民主输出下，输入国不同程度出现政局不稳、社会裂痕扩大、多数专制、国家治理能力不足等政治困境。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是美国民主输出的内在缺陷，包括西式民主理论与实践的困境、输入国社会同质性的缺乏以及政府效能的低下。中国民主化的转型要走出一条摆脱美国民主输出的道路，为世界提供民主化转型的“中国方案”。

关键词：民主化；“第三波”；阿拉伯之春；美国民主输出；政治发展

民主是现代政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主题，对此概念的理解是本文研究的逻辑起点。通常，“民主”会被当成一个政治哲学问题来处理。最经典的提法是由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提出的“人民主权”思想。目前西方的自由民主模式居于主流地位，即以多党竞争、普遍选举、代议制政府和政治分权为特征的政治模式，这种模式在西方社会建立、实践后，被普遍认为是“民主”的楷模。但是，世界各地的情况存在很大的差异，在现实政治层面，民主最终落脚为一种社会机制，即使是美国民主也与西方民主理论在具体制度设计层面存在诸多不同，最典型的是代议制民主的实现形式不同，而且，美国三权分立的总统制与英国议行合一的议会制在实际政治操作中也具有很大差别。因此，对后发国家更重要的现实意义是在政治发展的语境下理解“民主”，也就是考虑民主的转型问题。更多关注已经发生什么和正在发生什么，而非“应该”发生什么。简言之，即如何以经济—历史—文化—社会之间制度的构建方式达成“民主”的实际效果。因为对转型的经验研究不足，所以人们对乌克兰、泰国、伊拉克与埃及的转型乱象普遍会产生迷惑甚至失望的情绪。

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必须了解和把握当今世界重要潮流的发展趋势，而当今世界潮流的一个重要趋势就是美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民主输出。本文通过对美国民主输出推动下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以及近几年阿拉伯之春后的西亚北非、埃及、乌克兰等国的最新发展趋势的考察，来剖析美国民主输出背后的深层原因，以及美国民主输出所必然导致的输入国的困境。

一、世界民主化浪潮与美国的民主输出

民主化浪潮就是一个时期内大批国家走向民主化。对当代世界民主化发展的趋势，学术界普遍认同亨廷顿的提法，即他在《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中提出的，近代以来世界上大致历经了三波民主化浪潮：第一次民主化长波为1828年－1926年，起源于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出现了32个民主国家，这次民主化浪潮初步形成了近代民主国家体系；第二次民主化短波为1943年－1962年，此间出现的民主国家有40个，这主要

是在二战的推动下产生的一大批民族解放运动的新兴国家；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为 1974 至今[①]（始于南欧葡萄牙康乃馨革命），这次民主化运动呈现出来的特点是时间跨度长、波及范围广、造成的世界影响大（亨廷顿，1998：12-26）。根据自由之家的统计（见图 1），1974 年，民主国家有 44 个；到了 2008 年，民主国家数量增加到 91 个，近年来有所回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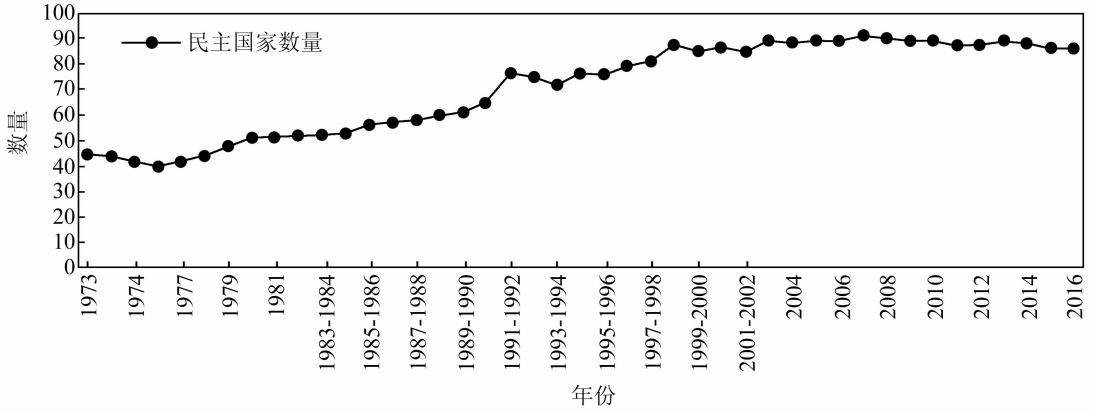

图 1　1973 年以来民主国家数量统计图[②]

“第三波”民主化浪潮还体现出一种板块轮动的特点，跨越了全球四大板块。1974 年“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发端于南欧的葡萄牙、西班牙，70 年代末涌入拉美，80 年代开始，亚洲的菲律宾、韩国、印尼也卷入其中，尤其是在 90 年代初前苏联东欧国家的全面解体，将这次民主化浪潮推向高潮。但它并没有结束，21 世纪初，民主化浪潮开始蔓延向北非及中东国家，包括突尼斯、埃及、叙利亚、伊拉克等。

一般认为，“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政治转型主要有如下几方面的原因：

（一）在经济发展和全球化的作用下，威权政体的合法性危机日益突出

威权政体（Authoritarianism）通常指介于“极权政体”和“民主政体”之间的过渡政体。《布莱克威尔政治学百科全书》（The Blackwell Encyclopedia of Political Science）中将威权政体定义为“一种统治形式，或是拥护这种统治形式的哲学，在这样的统治形式之下，统治者把他们的价值观强加给社会，全然不顾其他成员的意愿”（米勒等，1992：72）。结合后发国家工业化进程中的经验，奥唐奈（O’Donnell）将威权政体能够运行的原因归结为：在政治上权力集中，在经济上推行自由市场经济的“政治高压、经济增长”模式。当各阶级分享经济成长的果实、政治参与意愿不高时，政府对民间社会的压制成本过高，威权政体可能维系；一旦经济发展面临瓶颈，政治系统无力解决，而此时不满的社会阶级高度动员，政府对民间社会容忍所要付出的成本就迅速提高，当容忍成本明显高于压制成本时，威权政体就容易出现危机（O’Donnell，1973：89）。即威权政体一旦出现严重的经济问题，政治合法性就会受到挑战。比如，突尼斯就是威权政体倒台的典型案例，虽然 2011 年突尼斯国内发生的是一场政治变革，但其直接原因还是经济问题。突尼斯地理上紧邻地中海，是欧洲人的度假天堂，这种度假经济使其成为欧洲经济的依附性国家，全国 14％的劳动力为欧洲人提供服务，曾经被称为“非洲最有竞争力国家”。因此，突尼斯的经济结构十分依赖欧盟，欧洲 2008 年发生金融危机后，对突尼斯这种依附性经济的打击很大，一个偶然的事件就引发了政治变革。此外，还造成这些国家的威权统治出现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如贫富悬殊、高失业率等等。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埃及，虽然作为非洲第二大经济体，但其国内经济发展的成果几乎不能惠及广大人民，而这也为埃及 2011 年发生政治动荡埋下了底层原因。

---

①研究民主化的学者如 Larry Diamond 等认为第四波民主化的潮流将在中东、北非与东亚等专制独裁国家发生，但学术界普遍认为发生在中东与北非的事件仍属于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余波。

②资料来源：自由之家网站，https://freedomhouse.org。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是一个国际性的非政府组织，成立于 1941 年，总部位于美国华盛顿，致力于民主、政治自由的研究和支持，其最知名的是对各国民主自由程度的年度评估，该报告常被用于政治科学的研究。从 1973 年到 2016 年的民主国家数量为作者综合每年的报告数据所作图表。

(二) 经济发展带来社会动员加剧与民主意识的增强

经济发展往往会带来社会动员的加剧,而这可能导致政治动乱。早在托克维尔研究法国大革命发生的原因时就发现,法国大革命之前经历了持续的国家繁荣,但经济繁荣并没有使民众安居乐业,反而使得民众对未来存有更高的期许,形成强大的社会动员基础(托克维尔,1997:209)。亨廷顿在研究"第三波"民主浪潮时也发现,经济发展使人们的期望值提高,当期望超出了经济发展的速度时,会产生社会挫败感;如果社会流动的机会不足,社会挫败感就有可能转化为政治参与的动力,刺激个人与集团投身于政治,因此,他认为,现代性带来稳定,而现代化会引起动乱(亨廷顿,1989:51)。此外,经济发展带来的民众教育水平提高、社会多元化和中产阶级壮大等结构性要素,使新生的利益体企图寻求政治权利,在社会大众层面表现为不断增强的民主意识。社会动员加剧与民主意识增强,为"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的政治转型准备了社会条件。

(三) 民主化浪潮的"滚雪球"[①]示范效应

民主化浪潮的"滚雪球"效应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网络传播对民主化的倍增效应,全球通信技术飞速发展,新媒体时代的信息制造与获取的途径发生了深刻的变革,政府不再是单一的信息来源,平民化的网络平台实现了大众参与,这种自媒体方式突破了政府的信息垄断。比如谷歌高管工程师韦尔·戈尼姆(Wael Ghonim)于 2010 年在 facebook 上创建了一个名为"We are all Khaled Said"(我们都是哈立德·赛义德)的页面,旨在抗议 2010 年 6 月被警察打死的商人哈立德·赛义德,反抗政府的高压。2011 年 1 月 14 日,他在该页面发表了一篇题为《1 月 25 日革命:折磨、腐败、失业和不公正》的长微博,动员埃及网民于 1 月 25 日走上街头,效仿突尼斯人民那样进行游行示威,网民们在短期内纷纷响应,点击率持续增加,将全国抗议示威情绪引向高潮,民众纷纷走上开罗街头集会,游行示威最终演变为一场"和平革命",穆巴拉克最终下台。社会动员从初期相对小规模的抗议活动,借助于网络传播,逐渐发酵为大规模的社会运动,突显出网络传播的倍增效应。在利比亚战争中,反政府组织"网络活动家"也曾利用社交网络呼吁将 2011 年 2 月 17 日星期四定为"愤怒日",仅在 2 月 16 日这一天,网上报名的追随者就超过了 4000 人,到 2 月 17 日,拥护者更超过了 9600 人(苏进昌等,2011),最终加剧了利比亚的动荡局势。2010 年末,facebook 网站大约 15%的活跃用户来自于中东地区[②],用户高达 1700 万(其中埃及拥有 500 万,突尼斯拥有 200 万,占该地区网民总数的绝大部分),Twitter 用户年增长率高达 142%(唐岚,2011:54)。二是地理上接近、文化上相似的国家之间存在巨大的示范效应,特别是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第一个向民主过渡的国家会刺激其他国家的民主化,并为后者提供示范。比如 1974 年葡萄牙威权政体倒台,对西班牙、希腊等南欧国家造成直接影响,波兰的民主化进程推倒了苏东剧变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还有 2011 年突尼斯发生的"茉莉花革命"对埃及、利比亚、也门、叙利亚产生的这种"溢出效果"也都体现了"滚雪球"的示范效应。

(四) 美国的民主输出推波助澜

美国民主输出最早出现在一战前的美国"门罗主义"战略中,其主要的输出对象是拉丁美洲。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民主制度输出的重点逐步扩大到亚洲和欧洲,二战后的重点是日本和德国。到 20 世纪 90 年代冷战结束后,克林顿政府提出了"新干涉主义",小布什政府时期提出"先发制人"战略,正式启动了大中东民主计划及"颜色革命",尤其是"9·11"之后,布什政府借反恐战争之名推进此战略。奥巴马继任后继续这一战略,同时,美国民主输出也出现了一些新动向。以往美国在推行民主化时,强调"照搬"美国制度,要求建立"三权分立"、"一人一票"的制度体系,但这些"高大上"的政治制度往往难以解决落后国家的社会发展问题,因此很难成功。如今,美国则将更多精力置于输出"民主的细节"方面。美国不仅通过美国国际开发署(United State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USAID)此类独立的联邦机构(政府部门)影响他国民主化进程,也开始越来越重视通过民间组织的资金支持与交流,来

---

①"滚雪球"效应最初由塞缪尔·亨廷顿在《第三波——20 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上海三联书店 1998 年,第 113 页)中提出。

②Randi Zuckerberg. "Facebook plans to focus heavily on Middle East", in gulfnews, http://gulfnews.com/business/sectors/technology/facebook-plans-to-focus-heavily-on-middle-east-1.697959, 2010-10-18.

影响对象国的民主化建设程度。比如，成立于 2004 年的世纪挑战集团（The Millennium Challenge Corporation，MCC）是美国以民主为核心发展策略的非营利机构。其目标是将资金投给美国认为的民主国家，投资于其基本的经济设施，确保资金流向有利于这些国家向民主化方向转变。近些年，针对印尼、菲律宾等频遭海啸台风袭击的国家，美国趁援助救灾之机进行民主输出。2014 年，MCC 与印尼、菲律宾等 9 个国家达成契约，承诺“帮助”这些国家修建防灾减灾网络，借此推进当地“公民社会”的建设。

从历史的角度看，美国的民主输出终究是其基于国家利益的战略考量，从形式上，输出的是民主的观念、形式甚至制度；但本质上，输出的仍然是美国自身的意识形态，收获的是美国的国家利益。

1. 美国民主输出最核心的动机是国家利益驱动。美国民主输出目的在于建立美国统治下的世界经济政治秩序。亨廷顿在 1999 年《外交》杂志上曾说过：“阻止他国获得可能会对美国的优势构成挑战的军事力量；……对达不到美国标准的国家实行制裁；打着自由贸易和公开市场的旗号推动美国公司的利益；从美国的利益出发制定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各项政策；胁迫他国奉行有利于美国的经济和社会政策；推动美国海外军售”（Huntington，1999：38）。这些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都是支持美国民主输出的原因。

2. 美国的民主输出表现为具有价值取向的支持。罗宾·威廉斯（Robin M. Williams）在《美国社会：一个社会学的解释》（American Society：A Sociological Interpretation）中曾指出美国人的价值观中强调一种“道德追求与人生意义”，这使美国人具有一种价值上的优越感，认为自由、民主、平等这样的价值追求使美国人具有了一种宗教性的“美国信念”，这种信念就使美国在国际竞争中占领了道德高地，自然取得了舆论优势。美国向外输出的美国大片、自由女神像等各种文化产品与形象，都在高调宣传他们的价值观、使美国人具有“上帝选民”的优越感和“天定命运”的使命感。

3. 美国的民主输出受制于其新保守主义价值观及“民主和平论”指导下的外交战略。美国在新保守主义的指导下，打着保守、维护自由的旗号，对外实施强硬的单边主义外交战略。小布什时期的外交政策的基调是，一种稳定、长久的和平必然建立在民主、自由价值得到普遍认同的基础上。同时，美国以“民主和平论”为其外交战略提供合法性支持，有学者认为美国民主输出的理论基础是 M. W. 多伊尔（M. W. Doyle）在《康德、自由主义遗产和外交》（Kant，Liberal Legacies，and Foreign Affairs）一文中提出的“民主和平论”，即一个自由民主国家不会同另外一个自由民主国家打仗（Doyle，1983：207-208），也就是将自由国家视为民主国家，而自由国家之间不会发生战争。在奥尼尔和卢赛特（Oneal & Russett）看来，正是由于民主的不断推进、世界经济相互依赖的不断加深以及国际组织的不断发展促进了民主国家之间的和平（Oneal & Russett，1999：34），民主、经济相互依赖以及国际组织被视为康德理解和平的三脚架。支持此理论的观点认为，民主与和平的相互关系表现在两方面：（1）民主国家对国民有利。林恩·琼斯（Lynn-Jones）认为，民主国家的公民能够享有更大的个人自由、政治稳定、远离政府的暴力干预、较高的生活质量以及很小的遭受饥荒的可能性，因此民主国家的人民普遍会生活得更好①；另一种来自反面的论证认为政府权力的大小与对国民的政府谋杀成正相关。隆美尔（Rummel）发现相对于民主政权，专制政权对于本国公民尤其残忍，“政府谋杀”（Democide）更有可能发生（Rummel，1994：1）。（2）民主国家对国际和平有利。民主国家的生长有利于国际体系的和平，拉里·戴蒙德（Diamond）从反面指出恐怖主义盛行的国家多为世界上最为专制的政权，如伊朗、伊拉克、叙利亚、利比亚以及苏丹②。

然而，民主和平论本身值得商榷：（1）要所有国家都成为民主国家，将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民主是一个演化的过程，任何一个国家都始终处于演化的过程中，同样，民主的界定也应随之不断演进。诸如直到 1918 年，大约 40％的英国男性都因为户籍的限制而不享有选举权，而女性的选举权在 1918 年

①Sean M. Lynn-Jones. “Why the United States Should Spread Democracy”，Discussion Paper，Center for Science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Harvard University，July 1998. Belfer Center for Science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http：//belfercenter. ksg. harvard. edu/publication/2830/why_the_united_states_should_spread_democracy. html，1998-03-30.

②L. Diamond. *Promoting Democracy in the 1990s：Actors and Instruments. Issues and Imperatives*（A Report to the Carnegie Commission on Preventing Deadly Conflict）. Washington，D. C. ：Carnegie Corporation of New York，1995，7.

只有部分赋予,1928年才最终完全享有。在美国,妇女直到1920年才获得投票权,黑人则晚至20世纪60年代才获得投票权。(2)感知层面的民主会带来主观性判定,即一国往往会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判定其他国家民主与否。比如,在1941年末的时候,美国为了与苏联联合抗击德意志第三帝国展开了大规模的改观苏联旧有形象的公关运动。在此过程中,"苏联被描述成最民主的国家(Proto-democracy),斯大林也摇身一变成了和蔼可亲的'约瑟夫大叔(Uncle Joe)'"(米尔斯海默,2008:21)。(3)走向民主共和的过程往往容易发生战争①。历史经验表明,民主国家间也确实存在过战争。1812年战争、二战中芬兰决定与德国一致反对西方力量、美国南北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20世纪90年代南斯拉夫解体后发生的战争等,至少有17次冲突被列为民主国家之间潜在的战争(Ray,1998:Chap.3)。(4)即使所有的国家都变成民主共和,国际关系的本质——维护国家利益是否就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呢?人类的本性是否会随着政治体制而变化?这些问题仍然没有明确的答案。对这一理论的反对还见于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认为文明之间只可对话,不可同化,否则很可能不会带来和平,反而会导致冲突,尽管普遍民主化后,不同文明国家之间矛盾与冲突的处理可能更加文明。

二、美国民主输出下输入国的政治困境

美国以自由之名实施的民主输出,其实在国内和国际政治中出现了自相矛盾的情况。在国内政治上,他们为了维护民主,强调要防止出现一个不受约束的强大政府,不惜通过宪法来约束政府的权力,比如三权分立的政治设计、联邦与州之间的权利制衡、众议院与参议院的相互牵制以及美国宪法中对个人权利的各种保护,甚至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规定了美国人民拥有持有枪支武器的自由,以防止强大的国家机器对个人的侵犯。但是在国际政治上,美国的民主输出战略正在扮演着这个强大的不受约束的角色,打着"自由、民主"的崇高旗号,成为不受约束的"世界警察",万一它失控了怎么办?谁还能对他进行制约?美国输出民主的最大问题在于其输出方式的不平等性和强制性,强制性的民主输出反映出美国国内政治构建与国际政治行为之间的深刻矛盾。

同时,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许多实现了民主化的国家也同时经历着衰退。由于这些国家自身不具备现代国家的制度建设,整个国家在推行普选制的同时,其他各方面陷入了混乱和停滞不前,腐败、经济低迷并没有因选举而改变,从而形成了一种"民主空心化"的现象。根据拉里·戴蒙德的计算,"选举民主国家的数量从2006年顶峰时的121个降至2010年的114个,这是自1994年以来的最低值。"(戴蒙德,2012a:27)②在第三波实现了民主化的国家中,将近1/3都出现了民主的回潮甚至崩溃现象。虽然民主转型过程本身并非单线性,但是,在民主化的漫长进程中,经过美国民主输出的那些国家,其民主化进程出现了诸多政治困境却是不争的事实。

(一)政局不稳

阿拉伯之春后中东的相关民主状况在和平基金会每年的世界脆弱国家指数③中就有所体现。根据2016年的数据,世界上16个最脆弱的国家有10个在非洲、3个在中东地区、1个在西亚地区、1个在南亚地区,叙利亚、也门、伊拉克都排在了前11名。对比2011年,叙利亚从第48位上升到第9位,利比亚从第111位上升到第25位④。在过去的几年中,利比亚和叙利亚的国家状况恶化得最严重,已经成为全球稳定的最大威胁。这其实反射出在后阿拉伯之春的世界中这一地区不断上升的不安全感(见表1)。

牛津大学经济学家保罗·科利尔(Paul Collier)在《战争、枪炮和选票:危险地区的民主》(Wars,Guns,and Votes:Democracy in Dangerous Places)中阐释了这样一个观点:在中等收入国家,选举行为可以系统地减少政治暴力的风险;但在低收入国家,选举会使社会陷入危险境地(Collier,2009:18)。但即

①关于民主化国家容易发生战争的原因,后面会进一步论述。
②拉里·戴蒙德关于民主国家的数量统计与自由之家的标准不同。
③和平基金会(The Fund for Peace)是一个独立的非盈利研究和教育组织。1957年由美国投资银行家伦道夫·坎顿(Randolph Compton)创立的。基金会致力于防止战争和促进可持续发展。基金会每年发布的针对177个国家12项指标的世界脆弱国家指数(Fragile States Index)由《外交政策》杂志出版,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④2011年到2016年世界脆弱国家指数具体排名,见美国和平基金会FFP官网,http://fsi.fundforpeace.org,2016-06-27。

使在中等收入国家，不切实际的民主输入仍然可能导致灾难性后果。另一个突出现象是在伊拉克出现的目前世界头号恐怖组织 ISIS。2014 年 3 月 31 日，该组织在网上发布 2013 年近 400 页的《年度报告》，以文字配合图表的方式详述 ISIS 过去一年的“战绩”。报告中详细列出每年行动数字及行动细节，并将袭击方式及地区仔细分门别类，袭击方式包括暗杀、火箭炮等炮弹袭击、自杀袭击、设立路障关卡等。美国撤军以后，伊拉克一直在按照美国提供的时间表推进民主化进程，短短 7 年伊拉克已经有了全民参与的选举，但据报告内容，ISIS2013 年在伊拉克执行过近 1 万次恐怖袭击行动，还救出数以百计被囚的极端分子。与此同时，利比亚、也门和叙利亚呈无政府状态。可见，在现代国家制度不健全的地方，强制推行普选制，很可能让极端的东西，诸如恐怖主义，借助民主的土壤滋生。

表 1　2011－2016 年世界脆弱国家指数（前 16 位）

排名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1	索马里	索马里	索马里	南苏丹	南苏丹	索马里
2	刚果（DR）	刚果（DR）	刚果（DR）	索马里	索马里	南苏丹
3	苏丹	苏丹	苏丹	中非共和国	中非共和国	中非共和国
4	南苏丹	南苏丹	南苏丹	刚果	苏丹	苏丹
5	乍得	乍得	乍得	苏丹	刚果	也门
6	津巴布韦	津巴布韦	也门	乍得	乍得	叙利亚
7	阿富汗	阿富汗	阿富汗	阿富汗	也门	乍得
8	海地	海地	海地	也门	叙利亚	刚果
9	也门	也门	中非共和国	海地	阿富汗	阿富汗
10	伊拉克	伊拉克	津巴布韦	巴基斯坦	几内亚	海地
11	中非共和国	中非共和国	伊拉克	津巴布韦	海地	伊拉克
12	科特迪瓦	科特迪瓦	科特迪瓦	几内亚	伊拉克	几内亚
13	几内亚	几内亚	巴基斯坦	伊拉克	巴基斯坦	尼日利亚
14	巴基斯坦	巴基斯坦	几内亚	科特迪瓦	尼日利亚	巴基斯坦
15	尼日利亚	尼日利亚	几内亚比绍	叙利亚	科特迪瓦	布隆迪
16	几内亚比绍	几内亚比绍	尼日利亚	几内亚比绍	津巴布韦	津巴布韦

资料来源：美国和平基金会 FFP 官网，http://fsi.fundforpeace.org，2016 年 6 月 27 日最后访问。

（二）社会裂痕扩大

在民主化转型中，如果原有的社会中存在巨大裂痕，民主化转型一旦出现经济下滑等问题，就有可能有人利用民主手段清算仇恨，扩大社会裂痕。因此，对转型中的民主国家强制输出民主，也会导致输入国的政治困境。曼斯斐德和史奈德（Mansfield & Snyder）收集了近 200 年来的历史证据，认为向民主转型时期的社会会更倾向于战争。首先，旧精英往往会通过打民族主义牌来煽动冲突，使他们能够保留实力。其次，新兴民主国家缺乏强有力的民主制度，新统治者会通过打民族主义牌和寻找外国替罪羊来争夺支持（Mansfield & Snyder，1995：5-38）。也就是说，正在民主化进程中的国家，其政治精英更可能利用战争谋求个人的政治利益，他们往往借助民主的力量，打“民粹”牌，利用人们的仇恨政治心理拉选票。

乌克兰所特有的“钟摆式政治”现象可以说明这种情形，尽管这个例子并非是最典型的。乌克兰地处欧亚大陆的边界，东边是俄罗斯，西边是欧洲诸国，由于特殊的地缘政治和历史因素，乌克兰一直徘徊在“向东”还是“向西”的抉择中。在 2013 年 11 月的危机中，由于政府暂停与欧盟签署联系国协议，点燃了乌克兰政治动荡的导火线，这一政治动荡事件的关键还是在于乌克兰国内因“向东”还是“向西”问题所造成的深层社会裂痕。这样的对立其实长期存在，在前苏联解体以来乌克兰民主化转型的短短 20 多年间，作为国家根本制度框架的宪法历经数次反复修改，民主在实践中演化为少数寡头之间的争权夺利，党派林立和政治纷争导致每次选举都危机重重，社会经济发展陷入停滞。民主并未带来政府的廉洁，2013 年公布的世界廉洁指数，在总分为 100 分的测评中，乌克兰仅得到 25 分，在参评的 177 个国家

和地区中位列第144位①,连续多年被评为"严重腐败"国家。由于长期腐败,社会经济日益凋敝,2012年乌克兰的实际GDP仅相当于1990年的69.5%。广大普通民众的生活境况长期得不到改善,民主化转型中一旦触及"向东"还是"向西"这个敏感的话题,大众的不满情绪立即高涨。

(三)多数专制

在民主化转型的过程中,还有可能由于社会缺乏民主训练而使经过多数选举出来的政府反而与民主背道而驰,多数民主变成了"多数专制"。最早,亚里士多德就曾指出,在一个穷人充斥的社会,富人作为少部分人会视民主为暴民政治。李普赛特认为,只有当经济发展,中产阶级扩大,阶级结构从金字塔形转变为钻石形,富人对于暴民政治的恐惧才会减轻(李普塞特,1997:416)。利普哈特指出,如果一个社会没有重大的种族、宗教、语言、政治等分歧,只剩下阶级的分化,大可实行两党制、单一制的多数民主模式;但如果出现上述的重大分歧,就必须正视"大多数人暴政"的问题,要设置更多权力制衡(利普哈特,2006:23),而不是简单地放弃民主。2011年埃及民选的穆兄会背景的总统穆尔西和随之而来的民众抗议风潮就是这一问题的具体体现。民选总统受到民众的大规模反对,原因其实是和"多数专制"有关。埃及存在两股主要的势力:一种是埃及第一次通过民主选举选上来的总统穆尔西代表的穆兄会势力,其主要支持者是对穆巴拉克政权独裁统治不满的中下层民众,也是这个文盲率极高、贫困人口占大部分的国家中的大多数,如果一人一票选举,往往会是人口占多数的穆兄会势力获胜。还有一种是城市中产阶级,即当年走上解放广场上参加革命的人。2014年5月,曾对穆兄会支持者进行镇压的埃及前军方领导人阿卜杜勒-法塔赫·塞西(Abdel Fattah el-Sisi)在混乱下以96.9%高票当选新任总统,通过强硬的手段获得稳定扭转了"多数专制"的悖论。但是塞西也是继穆巴拉克以后又一位出身于军人的总统,他的上台将埃及再次带回军人统治的政治传统,个人政治选择对国家民主道路的影响仍占主导地位,民主化道路中仍然充满变数。甚至有学者认为,埃及出现了新的独裁统治,虽然允许了议会选举,但其他各方面民主制度严重缺乏。可以看出,在埃及这种处于民主化进程中的国家中,由于国家分化严重,单靠选举式民主不但不能让人民满意,甚至容易失控。

(四)国家治理能力不足,民主合法性下降

民主化过后经济社会长期停滞不前,选举程序并没有带来管治成效的必然性及认受性。福山在《为何民主表现得如此差劲?》(Why Is Democracy Performing So Poorly?)中认为,"未能建立现代化的、治理良好的国家,是近来民主转型的致命问题"(Fukuyama,2015:12)。国家治理能力的问题,也许是比简单粗暴地输入民主更加重要的问题。过去30年间,民主已经深深扎根于拉丁美洲大多数国家,但直到今天,巴西、哥伦比亚和墨西哥等国仍然缺少提供教育、基础设施和公民安全等基本公共服务的能力。按照美国政治制度而建立起来的菲律宾,也出现了治理无效的现象,因为其社会结构仍然带有严重的封建色彩,选举只是强化了落后的社会结构。在社会结构未得到现代化改造之前,实行竞争性选举无法达到预期的民主目的。"如果现代国家政权的巩固早于选举权的推广,国家通常能在现代继续存活;如果民主早于国家改革,则往往会招致裙带关系的泛滥。……如果不具备出色管理的能力,新的民主政府会辜负追随者的期望,从而推翻自己的合法性"(Fukuyama,2015:19)。

这些国家中的腐败也并没有因为选举制的推行而得到有效的抑制,其深层次原因仍是国家治理能力低下导致的"无效的多元主义"。"在肤浅的民主体制中,往往容易产生一种无效的多元主义,除了偶尔的投票之外,政治参与并没有多少真正的内涵,因为政治完全掌握在精英们的手中,并且腐败和不回应人们的要求。"(Carothers,2002:10)根据透明国际组织2015年针对中东"后阿拉伯之春"9个国家和地区中近11000名成年人的调查显示②:该地区61%的人认为在过去12个月腐败趋势持续增加,并且近

①关于2013年世界廉洁指数的数据,来源于透明国际组织网站,https://www.transparency.org/cpi2013/results,2013-11-30。透明国际组织(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是一个监察贪污腐败的国际非政府组织。从1995年起,透明国际每年制定和公布清廉指数,提供一个可供比较的国际贪污状况列表,具有一定国际影响力。

②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People and corruption: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survey 2016, https://www.transparency.org/whatwedo/publication/people_and_corruption_mena_survey_2016, 2016-05-03. 此报告受访者包括10797成年人。从2014年9月至2015年11月,在阿尔及利亚、埃及、约旦、黎巴嫩、摩洛哥、巴勒斯坦、苏丹、突尼斯和也门9个国家和地区进行了调查。

期不太可能好转，近 68%的人认为政府在反腐败中几乎无能为力。这项调查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这一区域的政府并未满足那些 5 年前走上街头的人们的期望，包括阻止腐败与压迫、希望政府更加透明与负责任等。哈佛大学教授 J. 布朗利(J. Brownlee)等 2015 年 9 月出版的《阿拉伯之春——镇压与革命之路》(The Arab Spring：Pathways of Repression and Reform)，评估了阿拉伯之春后中东的民主状况并不尽如人意的原因：第一，更具革命性的革命，更难带来民主的结果。因为，缺乏妥协、包容，只会带来冲突甚至内战，包容共存才是民主的应有之义；第二，他们认为"阿拉伯之春"强化了一种认识，即国家的重要性(Brownlee，et al.，2015：169-210)。许多表现不好的民主国家存在着更为普遍的建设国家的紧迫任务，包括改善政府的技术能力、资源、专业标准、凝聚力以及组织效率，以使其能更好地维持安全、树立权威、解决纷争、颁布法律、收取赋税、维持市场秩序、管制商业、管理经济、发展基础设施以及提供诸如医疗、教育和水源之类的服务。一个国家在成为富有成效的民主国家之前必须能够发挥这些基本的职能，国际社会在进行干预并企图使失败的国家重回轨道时，已经痛切地认识到这一点：没有强大的国家就没有共同的力量使大家保持一致，结果只能是导致混乱。

三、美国民主输出为何必然导致输入国的政治困境

大多数向民主化转型的国家都出了问题，而且不是一时就能解决的难题，其原因固然很多，比如经济发展水平、政治文化、公民素质、教育水平等，但问题绝不仅限于民主执行中，深层次原因出在民主本身。

(一) 西式民主理论与实践的困境

当今世界西式民主观念中最流行的就是被称为"竞争性选举"的"熊彼特式民主"。在熊彼特那里，"人民主权"被理解为"选举民主"：民主就是以选举为核心的一个政治过程，它的目的是使人民选出合意的政治家，即民主就是选民选举政治家的过程。候选人或政党很可能为了拉取选票而迎合选民心态，在西方和非西方国家中表现出两种可能：(1)在西方国家，民主可能会强化制度的保守性，政治候选人为了能赢得选举，其行事方式往往尽量贴合本国民众的水平与特征。候选人的长相、风度、行为方式，甚至是与选民的相似度都成了获取选民支持的重要因素。比如，小布什的形象平易近人，就像一个值得信赖的邻居，不善言辞反而成为他获胜的重要原因。还有 2016 美国大选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因为其简单直接的短句语言与行为方式，备受选民关注。这种民主的媚俗化会导致社会精英的边缘化，社会竞争动力不足，从而使社会日益趋于保守。(2)在非西方文化传统的后发国家，民主的媚俗化可能使民主制度日益偏离其核心价值，从而招致西式民主政治的变种。比如埃及的穆兄会式的伊斯兰主义民主、南美的民粹主义民主，都产生了民主转型的乱象。选举式民主的不稳定性，使得民主往往很难追寻其传统的核心价值。

此外，选举民主本身在西方政治实践中也长期陷入困境，以美国为例，主要表现为：(1)西方选举民主在长期实践中出现低投票率所带来的公众参与的下降。"自 1948 年以来，不到 65%的合格选民参加总统选举的投票，而且在 1980 年之后的七次总统选举中，四次的投票率不到 55%。在地方选举中，参与投票的美国人甚至更少——平均只有约 1/3 的合格选民投票"(戴蒙德，2012b：318)。罗伯特·帕特南曾在《独自打保龄：美国社区的衰落与复兴》中，将这种现象归因于美国社区精神的衰落，社会资本的下降，人们缺乏面对面的合作方式，从而难以形成信任与合作的基础，而这些正是托克维尔最推崇的美国精神。近年来，协商民主理论成为西方民主理论中的热点，普遍认为是对选举民主理论进行的补充与完善。(2)选举民主带来党派固化，产生脱离选民民意的危机。福山在《衰败的美利坚——政治制度失灵的根源》(America in Decay：The Sources of Political Dysfunction)中，对美国政治内在逻辑的观察得出了结论，即"否决政治"导致美国的"政治衰败"，美国党派之间已经很难合作，两党之间难以达成一致，容易引起政治系统的僵局及党派斗争极化(Fukuyama，2014：9)。具体表现为"支持两个政党的"(在国会选举中投票支持其中一个政党，而在总统选举中支持另外一个)众议员选区的概率降低，这一比例在 1972 年的时候是 40%，到 2006 年时大约只有 15%(Mann，2006：268)，这一比例的下降说明党派间已经出现了固化趋势。党派固化还表现为"以微弱多数获胜的边缘席位在消失"——边缘席位是指两大党的任何一方都差不多可能赢取的众议院席位。在过去 30 年中，平均少于 10%的席位在每次选举中会落到不同

政党的控制之中,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在20世纪的前半期,这一比例接近1/3。这一比例的下降,使更换议员的动力下降,出现议员的连选连任常态化,1946年到1950年间,87%的在任者获得连任,在2002年和2004年达到99%(戴蒙德,2012b:321)。竞争程度的减弱进一步使政治生活和公共政策两极分化,选举结果的固化同时使选民的积极性下降,选举也失去了其问责的本质目的,最终脱离了民主通过制度化手段体现民意的本意。(3)在面临民族与宗教问题时,选举民主可能导致社会的撕裂。最新的例子出现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两党竞选的过程中,出现严重的社会撕裂与对立,政治出现激进化趋势。尤其是在面对2016年6月12日美国奥兰多枪击案时。这次枪击案共造成包括枪手在内至少50人死亡,53人受伤①,是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大规模枪击事件,死伤人数仅次于9·11恐怖攻击事件,初步认定行凶者为29岁的美国公民奥马尔·马丁(Omar Mateen),枪手在袭击前宣称自己响应ISIS的伊斯兰圣战号召;事后ISIS发表声明,宣称对此事负责,并追封奥马尔为"烈士"②。此次事件在美国社会引发两种观点的激烈对抗,一种是支持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的观点,即美国应采取适当的移民措施限制"激进伊斯兰"份子;另外一种是支持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的观点,即美国立国根本是多种族民主包容共存,反对采取限制移民措施。两派各执一词,在美国普通民众中产生了激烈的对抗。如果以激进手段对穆斯林采取强硬措施,会更加激化美国社会的撕裂,产生民众之间的仇恨,陷入了"利用仇恨政治心理拉选票"的民粹主义陷阱,同时也与美国一贯宣扬的自由、博爱、宽容的价值不符;另一方面,如果采取以往的宽容与不作为,则无法满足人们对安全的现实需要,从而降低政府效能,终将损害民主本身。美国民主的现实困境,证明了美国民主并不完美,仍然面临政治发展的问题。

(二)维系民主政治的社会文化基因的缺乏

选举式民主需要一些基本条件,否则容易导致政治动荡。达尔曾指出,"我已经一再地表明,一个国家的某些基础性或背景性条件会有利于民主的稳定。这些条件如果过于脆弱,或者完全缺乏这些条件,那么民主制度不可能存在,或者,即使它存在的话,这种存在也非常不稳定。"(达尔,1999:155)选举民主是大多数群众参与的政治活动,最重要的应该是社会同质性条件,如果参与政治活动的人处于对立或异质化结构中,很容易导致冲突的结果。社会同质性条件中首先需要共同的国家认同与大致相同的利益趋向或选择,如果缺乏这些共同选择,很容易在民主化过程中出现分裂,比如乌克兰的"钟摆式政治"就是公民对"向东"抑或"向西"的选择产生了分裂。鉴于民主是一种必然的选择,而在文化或民族分裂国家进行政治融合是非常困难的,"合作式民主"被有些学者认为是这种政治融合的可能路径,即通过比例代表制实现不同亚文化群体在立法机构中的席位,利普哈特在《多元社会中的民主:一项比较研究》中对此作了相应论述(利普哈特,2013:45-70)。但除了少数国家如荷兰外,"合作式民主"很难真正实践成功,"对于许多文化上四分五裂的国家,这一办法需要的许多有利条件、甚或必要条件,其实非常脆弱,或者完全不具备"(达尔,1999:203)。在黎巴嫩、尼日利亚和斯里兰卡,一些非常巧妙的安排虽然一度实现了稳定,但面临种族冲突的压力,最终又都宣告失败,国家或者陷入内战,或者沦为专制统治。选举民主本身具有冲突性,如果发生在社会缺乏同质性的国家,各个亚文化群体冲突难以融合、妥协、包容,很容易导致民主化中的冲突。因此,"要解决文化分裂的国家面临的各种问题,并不存在什么普遍适用的办法;每一种办法都应当适应该国的特点"(达尔,1999:205)。

(三)忽视维系民主政治的硬件条件——政府效能

从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发展中可以看出,没有一定的政治权威与政府效能,民主政体将无法维系。在立国之初,美国联邦党人详细论证了国家性与有效政府对一国的重要意义,建立了中央相对集权的强大的联邦政府,以保证政治上的统一,实现了国内安定,促进了经济繁荣,但也不过多地侵犯各州和个人的权利。对不少转型国家来说,无法通过民主的方式形成有效的政府能力,是民主搞不好的重要原因。如果民主化过程中,政府缺乏效能,无力应对重大的政治经济外交问题,无法掌控关乎国计民生的重大

①"50 Dead, Islamic Terrorism Tie Eyed in Orlando Gay Bar Shooting", http://www.cbsnews.com/news/pulse-nightclub-shooting-orlando/, 2016-06-12.

②《美国遭受911后最惨烈恐怖袭击 IS已宣称负责》,载环球网,http://mil.huanqiu.com/world/2016-06/9031706.html,2016-06-13.

问题，最终将无法维持民主政体的合法性。西方往往是国家制度建设在先，民主化在后。但是这个顺序往往会在民主条件尚未成熟之时就进行民主化转型的后发国家中倒过来，在废除了政府管制后，由于整体国家治理体系的脆弱与治理能力的低下，新政权往往难以为继。“实际的情形是，一旦大众民主化发生，很多基本国家制度包括法治就根本建立不起来。在没有基本国家制度的情况下，民主往往成为政治激进化的根源”（郑永年，2014）。约瑟夫·奈在《全球化世界的治理》中指出这些民主转型中的落后国家“由于经济增长乏力、普遍的贫困、效率低下的体制及技术的落后等因素，导致了这些国家的脆弱性，限制了它们控制、管理变化的能力”（奈等，2003：290）。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研究发展的专家开始认识到发展离不开政府的作用，这种负责任的治理机制就是所谓的“善治”。西方学者也开始从治理角度纠正“选举至上”的民主化理论。林茨在《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南欧、南美和后共产主义欧洲》中强调了国家的重要作用，“民主是现代国家的一种治理形式，没有国家，就不可能有现代民主”（林茨等，2008：78）。步入民主化进程中的国家与现代化初期的国家一样，都面临国家建设的基本任务，国家治理能力对民主具有重要意义。

四、结　语

民主道路具有多样性，照搬美式民主并非好的选择。单纯照搬美式民主，往往在很多方面会陷入被动。我们看到，由于在长期的民主转型中找不到适合本国的道路，乌克兰整个国家的决策都受制于东西方其他大国的力量博弈，在很多问题上都失去了话语权与国家力量，社会也因此出现巨大裂痕。对于后发国家，比起被动的被“美国民主输出”，不如变被动为主动，积极寻求适合本国国情的民主转型之路。比如，郑永年提出中国模式也是政治发展的重要形式，即“开放的一党制”，他指出：世界上有两种制度，一种是外部多元主义，如西方的多党制，一种是内部多元主义，如中国共产党开放的一党制。中国是一党制，但这个党作为这个国家的政治构成，是开放的，是不被少数利益集团所垄断的，任何一个社会群体的成员都可以进入这个政治构成。在这个政治构成里，大家可以互相协商、谈判、讨价还价、竞争。在实现民意表达的同时，避免了外部多元主义的内耗与低效，保障了决策效率和政策实施的效率①。比单纯的照搬美式民主更有现实价值的是进行民主政治文化、公民社会、社会裂痕弥合、公民素质的培养等重要的现代国家制度建设。以泰国、埃及两国为例。由于缺乏相应的妥协机制与妥协精神，自身又缺乏一系列与民主相适应的现代国家制度建设，这两个国家在民主转型过程中就暴露出了民主政治中“多数专制”的弊端。所以说，不能将民主化视为毕其功于一役的战役或革命，民主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中国正处于身份社会向契约社会的转型时期，各种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呈现出不稳定、难控制的态势，更需要在这种条件下，进行现代国家制度的建设，提高民主的适应性。“中国道路”需要重视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建设，中国目前政治变迁的一条可行路径就是通过治理推动整个政治体制的调整补充和完善，从而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建设。

参考文献：

[1] [美]拉里·戴蒙德(2012a). 今日之民主第三波. 天津行政学院学报，5.
[2] [美]拉里·戴蒙德(2012b). 民主的精神. 北京：群言出版社.
[3] [美]罗伯特·达尔(1999). 论民主. 李柏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4] [美]塞缪尔·亨廷顿(1989).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上海：三联书店.
[5] [美]塞缪尔·亨廷顿(1998). 第三波——20 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 上海：三联书店.
[6] 蒋传瑛(2012). 中东剧变对变革中阿拉伯国家经济的影响. 阿拉伯世界研究，6.
[7] [美]西摩·马丁·李普塞特(1997). 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 张绍宗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8] [美]阿伦·利普哈特(2006). 民主的模式：36 个国家的政府形式和政府绩效.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①郑永年：《中国未来 30 年的任务》，载 FT 中文网，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65137? full=y，2015-12-07。

[9] [美]阿伦·利普哈特(2013). 多元社会中的民主:一项比较研究.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0] [美]胡安·J·林茨等(2008). 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南欧、南美和后共产主义欧洲.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11] [美]约翰·米尔斯海默(2008). 大国政治的悲剧. 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12] [英]戴维·米勒等(1992). 布莱克威尔政治学百科全书.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3] [美]约瑟夫·S. 奈等(2003). 全球化世界的治理. 王勇等译.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14] 苏进昌等(2011). 网络在利比亚战争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中国青年报,2011-10-14.
[15] 唐 岚(2011). 社交网络:"中东波"的有力"助推器". 世界知识,9.
[16] [法]托克维尔(1997). 旧制度与大革命. 冯棠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17] 詹得雄(2014). 西方的民主制度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吗. 红旗文稿,9.
[18] [新]郑永年(2014). 当代民主出现了什么问题? 联合早报,2014-05-06.
[19] Jason Brownlee, et al. (2015). *The Arab Spring: Pathways of Repression and Refor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 Thomas Carothers(2002). The End of the Transition Paradigm. *Journal of Democracy*, 13
[21] Paul Collier(2009). *Wars, Guns, and Votes: Democracy in Dangerous Places*. New York, NY: Harper Collins.
[22] M. W. Doyle(1983). Kant, Liberal Legacies, and Foreign Affairs. *Philosophy & Public Affairs*, 12(3).
[23] Francis Fukuyama(2014). America in Decay The Sources of Political Dysfunction. *Foreign Affairs*, September/October.
[24] Francis Fukuyama(2015). Why Is Democracy Performing So Poorly? *Journal of Democracy*, 1.
[25] Samuel P. Huntington(1999). The Lonely Superpower. *Foreign Affairs*, 3.
[26] Thomas E. Mann(2006). Polarizing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How Much Does Gerrymandering Matter? in Pietro S. Nivola & David W. Brady(eds.). *Red and Blue Na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Causes of America's Polarized Politics*. Washington, D. C.: Brookings Institution.
[27] Edward D. Mansfield & Jack Snyder(1995). Democratization and the Danger of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0(1).
[28] Guillermo O'Donnell. (1973). *Modernization and Bureaucratic Authoritarianism: Studies in South American Politic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9] J. R. Oneal & B. Russett(1999). The Kantian Peace: The Pacific Benefits of Democracy, Interdependence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1885—1992. *World Politics*, 52(1).
[30] James Lee Ray(1998). *Democracy and International Conflict: An Evaluation of the Democratic Peace Proposition*. Columbia: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31] R. J. Rummel(1994). Power, Genocide and Mass Murder.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31(1).

The Export of American Democracy and the Plight of the Importing Countries

Gong Wenjing (Party School of Beijing Municipal Committee of CPC)

Abstract: It is reasonable and advisable to conduct the research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of world. The export of American democracy has mad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Third Wave" Democracy. The importing countries are suffering from political plight to different extent, including political instability, widened social cleavage, tyranny of majority, absence of state capacity, etc. The various political plight is caused by the inherent vulnerabilities of the export of American democracy, such as the dilemma of theories and practice of Western-style democracy, lack of social homogeneousness of the importing countries, and low administrative efficiency. This paper could shed some light for China to properly cope with the export of American democracy, take a new path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strive to contribute wisdom to the improvement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Key words: democratization; "The Third Wave"; Arab Spring; export of American democracy; political development

■**作者地址**:龚文婧,中共北京市委党校;北京 100044。Email:32700101@qq.com。
■**基金项目**:全国党校系统重点理论课题(2016)
■**责任编辑**:叶娟丽